



从亚太看世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论文精选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编



从亚太看世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论文精选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亚太看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论文精选/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编. —上海: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2008

ISBN 978-7-80745-227-0

I. 从... II. 上... III. 亚太地区—研究—文集 IV.
D730.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该字(2008)第 064540 号

从亚太看世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论文精选

编 者: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责任编辑:杨 国

封面设计:王斯佳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开

印 张:12.5

插 页:2

字 数:360千字

版 次: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745-227-0/D·038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建于1958年,迄今整整五十年。在半个世纪不寻常的岁月中,我院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建院到1968年建制撤销,是草创和早期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从1968年建制撤销到1978年恢复建院,我院科研和建设被迫停滞和中断;第三阶段,从1978年恢复建院至今,是我院持续发展、昌盛繁荣阶段。

我院创设之初,原是研究与教学并重的机构,设有政治法律系、工业经济系、贸易经济系、财政信贷系、会计系、统计系、业余大学和经济研究所,隶属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领导。1959年起改为比较纯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不再招收本科生。同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并入,并相继设立哲学研究所、政治法律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学术情报研究室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院的科研工作被迫中断,许多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作人员遭到残酷打击和迫害,科研和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至1968年底,全院除部分工作人员调市有关部门工作外,其余人员均到奉贤县“市直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劳动,被编入“市直五七干校六兵团”,我院建制被撤销。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仍有部分科研人员割舍不下对学术研究的独钟情愫,冒着被批判的风险,白天参加运动、劳作,晚上阅读、思索,以萤火烛光探照民族苦难的由来和前去道路。

1978年,我院恢复建制,和共和国一道步入崭新的历史时期。此后,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我院因时、因地制宜,广纳贤才,复所建所,一方面完成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和法学研究所的恢复重建,另一方面根据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陆续建立部门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情报研究所(1992年更名为信息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1992年更名为东欧中亚研究所,简称欧亚所)、青少年研究所、新闻研究所、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等一批新的研究所。2003年,为整合研究资

源、加强学术交流,我院先后成立了两个跨所联合的研究院,即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和社会发展研究院。前者由世界经济研究所、东欧中亚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四个研究机构组成,以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为研究重点;后者由社会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青少年研究所、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四个研究所组合而成,集中研究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和生活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此外,为了培植新的学科增长点,我院大力推进跨所、跨学科的院直属研究中心的建设。截至2007年底,我院先后设立了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长三角联合研究中心、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等约20个院直属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广结学缘,开展富有特色的学术活动,成为我院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我院拥有2个研究院、15个研究所和约20个院直属研究中心,学科门类齐全,机构布局合理,研究实力雄厚。到2007年底,全院在职工作人员81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640人,包括高级专业技术人员294人。

学术研究是我院中心工作,而学术的发展总是依托学科的发展。在过去五十年中,我院历届领导都十分重视学科建设,进入21世纪以来,我院更把健全和完善学科体系视为我院科研工作的重心。目前我院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产业经济学,世界经济,经济刑法,国际关系,上海城市史研究,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研究,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城市文化,思想文化等12个重点学科,以及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文化创意产业,家庭学,租界、租界地等特殊地区研究,犹太学研究,上海合作组织研究,西方文学文化批评思潮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经济伦理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国学术思潮史,科学哲学研究,信息资源管理,城市化研究等14个特色学科。这些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集中体现了我院的研究特色、实力和优势,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回首五十年风雨历程,我们有理由感到欣慰。尽管有过曲折和坎坷,但总的来说,我们坚持以学术为立院之本、以学术为育人之魂、以学术为强院之路,坚持厚德笃学、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发展之路,在不断强化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大力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和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自觉地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以学者的智慧积极回应改革开放时代的问题与挑战,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过程中累积起可观的思想资源和学术资源,也在这个过程中累积了一定的地位和声誉,我院因此而成为备受海内外学术界瞩目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镇,成为党和政府充分信赖的思想库、智囊团。

这套丛书以所为单位,每所一本,辑录各所在各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汇编成册,既是为了纪念我院五十周年华诞,也是为了集中展示我院过去五十年的科研成就。这套丛书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我院科研人员在过去半个世纪所走过的曲折而又辉煌的学术之路,凝结着我院全体科研人员在时代风雨洗礼下的智慧和良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过去的五十年我们在艰难的求索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积淀了丰厚的底蕴,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些成就、底蕴和传统已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并将转化为我院全面构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强大动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五十年中,我院将更加英姿勃发,灿烂辉煌!

2008年6月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序 言

刘 鸣

奉献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文辑,是我们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17 位新老研究人员学术成果的集粹,它是集我们过去十几年里在学术田野里辛勤耕耘的结晶和硕果。文集集中的绝大部分论文都曾刊载于国内权威的学术杂志上,其中的一些论点、概念、论断和理论框架具有一定的原创性、探索性和理论突破性,发表后曾引起了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战略问题研究的同行的争鸣和积极评价。

论文的一个特点是研究专题的跨度大,涵盖领域广,它包含了大战略、中国与美国外交、军事同盟关系、危机管理、国际体系结构、冷战史、海上安全合作机制、中国崛起的理论、软均势理论、五缘文化、封建时代的中日小农经济、日韩的经济发展、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法国思想家的民主理论等问题。这表明我们所具有较强的学科复合性和研究方向的多元性。

论文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包罗了我所发展历程中具有代表性的老中青三代的科研人员,他们中既包括创立“五缘文化”理论,名闻海内外的学术前辈林其铤先生;也有最初负责筹建研究所的主要领导之一,现任所长周建明研究员和现已经退休的原副所长王少普研究员;还有数位在 20 世纪 90 年代抵挡住下海浪潮的种种诱惑,不离不弃,甘愿清贫,目前仍然活跃在重点科研岗位的中年科研人员,如蔡鹏鸿、吴前进等,他(她)们是我们所学术振兴的中坚力量;最后,还有一批近年来进院工作,正在崭露头角的年轻的博士生。他们思想活跃,学科知识扎实,有志于长期从事学术研究,推动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愿为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外交政策制订、国际地位的提升贡献自己的智慧、知识和青春。

我们研究所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最短的研究机构,从 1991 年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 17 年的历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经历了初创时期的人员结构混杂,对研究对象和内容茫然无知,对世界和我国研究现状一知半解的困难时期。但经过所领导与广大科研人员的集思广益,齐心协力,虚心向同行单位的学习,积极拓展

院内外交流和海内外交流,我们在短短的几年里就从学术上默默无闻,没有重要科研骨干、没有课题、没有出版成果的单位,成长为亚太地区研究领域里一支新兴的、具有一定特色和实力的生力军。

由于时任所领导具有的战略眼光和精心构划的发展蓝图,所以,我们亚太所在起步的阶段就成功地抓了几件大事:这包括在1989年末研究所筹建时期,我们就出版了活页版的内部刊物《亚太研究》,到1991年研究所正式成立后,它又很快地转为48页的内刊《亚太论坛》,这为我们科研人员发表自己的成果提供了便捷。在《亚太研究》上,我们最早发表了林其燮先生的有关“五缘文化”的论文,该文在此后的国务院侨办的征文中又获了奖,并最终成为了学界、侨乡、海外华人和政府部门广泛应用的一种理论。

我们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打造学术团队和确立重点研究方向。当时成立了东南亚研究室、日本朝鲜研究室、台港澳研究室和社会研究室,并配备了学科带头人。在同仁的努力下,我所台湾专家参与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对台对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所学者就在东南亚举办的东亚安全的国际圆桌会议上亮相发言,并且获得了福特基金会有关“主权争议海域共同开发”的课题赞助;而发表在我们所刊上有关日本问题的研究成果很早就引起日本智库的重视;所里从事朝鲜问题研究的学者,在1990年就开始在全国性的学会上发言,其引用的材料和分析观点得到了与会人员的重视。1993年,我所在时任院领导的牵头下,首次开始承接全国重点课题——《亚太各国(地区)经济合作的前景与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同时,我们还首次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韩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在上海举行了国际会议。

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所还派出了数名科研骨干赴美国、日本的著名大学进行中短期的进修和从事课题研究。通过在海外学术机构的熏陶和访学,这些研究人员开拓了研究视野,提高了外语水平,也与这些国外机构和学者建立了正式交流关系。随着他们的回国,新的理念、学风和信息犹如徐徐的清风贯入了我们的研究所,研究所的学术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正是由于这些早期的奠基性工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才使我们所能够发展成为门类齐全、梯队完整、影响较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学术上开始厚积勃发,蒸蒸日上。首先,我们一批中青年学者获得了大量不同等级的研究课题,这包括周建明、王少普和蔡鹏鸿先后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美国的国防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美国冷战史解密文件研究》、《中国崛起与东亚多边合作》、《亚太自由贸易区研究》)等;王少普、刘鸣、蔡鹏鸿、杨红梅先后获上海市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吴前进先后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课题；刘鸣分别得到福特基金会课题和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课题、刘阿明获得院新近人员课题、高兰获得院重点课题等。

第二，在市和院的各项奖项评比中，我们所科研人员也屡屡获奖。如吴前进撰写的专著《国际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填补了此领域研究的空白，为此，她在2004年荣获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比一等奖。此后，2005年她还被授予上海社会科学院首届“张仲礼学术奖”；在2006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比中，她的论文又获得了二等奖。另外，王少普的合著《战后日本的防卫研究》在2004年荣获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比的二等奖。

第三，一些学科新增长点在我所崛起，成为我们学术发展的新标点，如周建明领军国际战略研究和国家制度建设比较研究、刘鸣牵头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蔡鹏鸿主导的APEC机制研究等。

第四，近年来，我所学者在北京一流的国际关系刊物和中国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成果呈增长的势头，这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太平洋学报》、《世界历史》、《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同时，在国际SSCI刊物中，我所学者也已发表了三篇论文。这种骄人的成绩确实是令人感到喜悦的。

当然，以上的成绩仅代表着过去，是一种低起点上的进步。与北京、上海的有关智库相比，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水平仍然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要达到中国一流和国际有影响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目标，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还须各位同仁的不懈努力。

我们出版这本文集既是对我院50周年华诞的一份献礼，也是对我们过去的成果的一个总结。我们应该以此为起点，设定一个新的目标，进一步提升我们国际关系研究的水平，繁荣中国的社会科学。亚太问题研究和地区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我们面前仍然还有很多未知的问题值得大家去探索。为此，它需要吸收各种相近学科的知识，也要求学贯中西的学识，更需要各位同事的刻苦专研、锲而不舍的学风、开放的心胸和求知若渴的态度。

最后，值此这本文集出版之际，我要向为这本书的付梓而辛勤劳动的周洁莉同志表示谢意。同时，对在我所不同发展阶段作出贡献的老领导和老同志——金行仁、王曰庠、俞新天、谈春兰、林同华、翁全龙、王秀文等表示崇高的敬意。对曾在我所工作过，不幸过早辞世的同志——张向华和张洁也表示我们的深切怀念。

2008年6月4日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CONTENTS

目
录

序 言 / 刘 鸣 / 1

国际关系与国际战略

国家大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利益 / 周建明 王海良 / 3

中国外交与国防战略初探 / 周建明 / 12

美韩同盟调整的动力、现状与前景 / 杨红梅 / 22

历史问题与中日危机管理中的美国因素 / 高 兰 / 33

试论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原结构与派生结构 / 刘 鸣 / 45

美国决策层对 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判断与对策 / 王成至 / 60

试析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 / 蔡鹏鸿 / 70

中国崛起:美国的认知与反应 / 刘阿明 / 79

“软均势论”及其实质 / 焦世新 / 90

后冷战时代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及其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 / 胡志勇 / 99

美国“转型外交”再思考 / 王伟男 / 110

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

“五缘”文化与未来的挑战 / 林其铨 / 121

封建时代中日小农经济的比较研究 / 王少普 / 136

步入 21 世纪的日本经济改革 / 全惟幸 / 147

韩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 王泠一 / 154

乡镇 平等 暴政 自由

——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 / 张 茗 / 165

新华侨华人与民间关系发展

以中国—新加坡民间关系为例 / 吴前进 / 173

国家大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利益

周建明 王海良

在进入 21 世纪之际,中国已站在确立自己作为大国和强国地位的门槛上。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在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外部条件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在 20 年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之后,中国需要根据新的内外条件和情况,重新检视自己的大战略,作为确保成为现代化大国的基础。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学术界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大战略”的概念。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大战略不仅应该包括国家的发展战略,还应该包括国家的安全战略,二者缺一不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对于中国的发展战略,人们已有很多的讨论。但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却还没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在这背后,对于决定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国家利益,也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研究。本文并不具体地讨论中国的大战略、中国的安全战略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应有的内容,而讨论有关国家大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基本概念以及它们的重要性,以期通过这种讨论,使我们在研究问题时有一个共同可以接受和使用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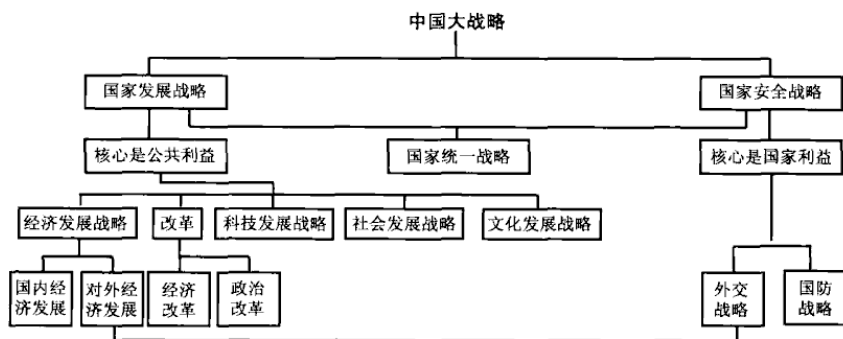
一、什么是国家的大战略

国家大战略(Grand Strategy),与国际上一般讨论的国家战略的含义并不相同。在美国,谈到国家战略,一般就是指国家安全战略。但是,当讨论的范围超出了国家安全战略,还包含其他内容,以及指一个长期的国家战略目标时,往往使用国家大战略的概念。

兰德公司 2000 年出版的 Michael Swaine 和 Ashley Tellis《解读中国的大战略——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其主要内容讨论的是中国的安全战略,但在第四章讨论中国目前的安全战略时,注意到中国把发展经济作为自己国家战略的首要内容,所讨论的内容已超出了安全战略的范围,因此使用大战略的概念来讨论

中国的战略。因此,美国也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大战略不仅应该包括国家的安全战略,而且也应该包括国家的发展战略。

笔者也主张国家大战略不仅应包括国家的发展战略,而且应该包括国家的安全战略。国家的大战略应是在国家安全战略之上,包含发展和安全两个战略,并综合考虑内外形势、可动用资源、国家的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大战略框架。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强调这种主张,不只是作为学术观点加以坚持,更是因为中国在发展和安全两个方面都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挑战,发展和安全两个战略都极其重要,缺一不可。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必须要采用国家大战略的概念,而不仅仅局限于发展战略或安全战略。按照我们的理解,中国的大战略所包括的内容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对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在一个发展与安全都存在激烈竞争态势的国际社会中,必须有一个本民族借以谋求生存、安全和发展的总体战略,也叫做大战略。国家大战略包含两个国家基本战略:一个是国家发展战略,一个是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是由公共利益也就是社会整体利益所决定的,涵盖国内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文化发展战略,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还有改革。国家安全战略则主要由外交战略和国防战略构成,其核心是国家利益。由于中国尚未实现国家的最后统一,因此还有一个国家统一战略。由于统一问题既涉及国家发展,又与国家安全相关,国家统一战略便是介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之间并与之贯通的战略,是中国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国家大战略中,发展战略为大多数人所熟悉,尽管对其中有些内容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但是对于国家的安全战略的认识却不充分,也不够完整。这是由于我们近20年来更多地强调发展,同时这2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外来威胁相对较低的时期,也由于我们对国家安全战略还没有一套较

为完整的理论和机制,因此它表现为我国大战略中相对薄弱的环节。这与我们所面临的外来威胁增强、挑战趋于严峻的形势极不相称,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大战略,并侧重要讨论国家安全战略和与其紧密相关的国家利益的原因。

二、国家的安全战略与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是明确的,即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它是在一定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背景下,根据自己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对现存和潜在威胁的判断以及可动用的资源,决定用什么方式或怎样分配和使用资源来对付威胁,最有效地保障自己的安全。一个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必须包括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对威胁的界定、对可动用资源的界定和如何分配资源三个要素。其中,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是基石。只有对国家利益作出明确的界定,并对不同的利益作出优先排序,才能对各种威胁的危害程度作出准确的判断,并有效地分配可动用的资源,最大限度地保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考虑国家的安全战略,以至于考虑国家的大战略,要以明确什么是国家利益为前提。

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是美国在冷战过程中,为明确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而发展出来的学说。它以地缘政治为基础,以现实主义的思想为特点,通过分析国家利益,以及进一步分析威胁来源及程度、可动用的战略资源,形成国家安全战略。关于国家利益在美国有不同的学说,摩根索的理论被认为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派。

摩根索用“权力”或“实力”(power)界定国家利益,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在摩根索看来,美国人先后以武力对抗轴心国和苏联不是出于对自由与正义的抽象爱好,而是因为他们最深刻的国家利益受到了威胁。他曾写道:“国际政治,如同一切政治,是一种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他认为判断外交政策的客观标准应该是:政治家们是否用实力来界定国家利益?也就是说,政治家的决策是维护和增强还是浪费和削弱国家的实力?他进而提出:“任何按国家利益这一标准实施的对外政策都必须与我们称之为一个国家的自然、政治和文化的实体有某种关联。在一个若干主权国家为了实力而相互竞争与对立的世界,所有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必须涉及作为最低要求的生存。因此,所有国家都做它们不能不做的事情:保卫它们的自然、政治和文化认同,防止他国的侵害。”可以说这是对为什么要界定国家利益最简单的说法,也是研究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的最基本原理。

国家利益有许多种。为使有限的资源能够有效地保护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就

必须要对不同国家利益的重要程度进行分类和排序。在对国家利益的排序上,摩根索按照重要程度,把国家利益分成核心的或生死存亡的(vital)和次要的(secondary)两种。纽克特莱因进一步发展了有关国家利益分类和排序的方法,形成“利益强度”说和更为细致的利益排序。纽克特莱因把国家利益分成4种,按利益强度依次为:生存的(survival)、核心的(vital)、主要的(major)和次要的(peripheral)利益。在他看来,生存利益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因为国家不能生存,便无其他利益可言了。核心利益也是国家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强力手段加以保护的利益。主要的和次要的国家利益虽然国家也应尽力保护,但没有必要使用武力。纽克特莱因的理论为判断是否该选择军事手段提供了一个重要依据。对国家利益分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解决当需要作出战略决策时,对按照不同利益的轻重缓急如何分配有限的战略资源提供了一个重要依据。

国家利益的学说对美国的战略界、外交界和国际关系的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国家利益的学说是美国现实主义的一种理论武器,但也常为理想主义所运用,强调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在全世界的传播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美国的学界和战略界中,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理解和界定有不同内涵,也有过许多争论。但是,有了国家利益这个概念,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就有了一个可供实证分析的基础,从而使美国的决策可以建立在更符合其利益的基础上。

在研究中国的国家利益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能全盘接受或照搬美国的理论作为基础。但是,研究这些理论,汲取其中的合理部分,为我所用,是我们构建自己的国家利益观和战略理论的必经步骤。

国内专门讨论国家利益问题的文献并不多。阎学通在他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虽然他力图区分在国际政治范畴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与国内政治范畴的国家利益(interests of state),但是由于没有区分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概念,因此在给国家利益下的定义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论述时,还是没有能够区分这两者。阎学通对中国国家利益提出的定义是:我们可以将“国家利益”定义为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尊重与承认。

我们认为,这种定义不够准确。因为安全是国家利益考虑的范围,发展实际上是由公共利益所决定的,它们分属于发展和安全两个战略的范围。同样,国内的政治稳定也不是属于国家利益的范围,而是公共利益的范围。

由于没有建立起国家大战略与发展、安全战略之间关系的框架,没有区分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就容易在国家利益的概念下,谈论整个大战略所包含的内容。它

表现在,阎学通在讨论邓小平关于国家利益的思想时,把“国家利益”混同于“根本利益”,认为邓小平“总结出现代化建设是最大和最根本利益后,就要求各项政策都要服务于这个利益”。“邓小平还将国家利益具体化,使之成为衡量各项政策的标准。”即1992年邓小平提出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里讲的实际上是决定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而不是决定外交和国防战略的国家利益。

就一个国家的基本利益而言,由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两个部分组成。由社会整体利益所决定的是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它决定国家的公共政策。一个国家在对外发生关系时所涉及的利益,是国家利益,也就是国家的安全利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大战略的两个不同的基础。公共利益决定国家的发展战略,国家利益决定国家的安全战略。美国的学者曾提出过这种概念,我们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概念的划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区别与界定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国家的安全战略。

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社会,发展和安全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基本目标。发展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以改善和增加人民的福利,并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增强维护安全的资源。发展的命题是如何有效分配资源,以取得最大的效益。安全是指避免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外来威胁。安全的命题是决定如何分配和使用现有的资源来保护国家的利益。就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而言,发展可以为国家安全提供更多的资源,但并不必然自动地带来安全。一个国家发展了,对国家安全显然是有利的。但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也可能因为发展而反被别人认为是威胁的来源,从而作为对手来对付,增加安全上的压力,使安全系数下降。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就是在中国表现出稳定的高速增长态势时出现的。现在,美国的战略界和军事部门把中国当做“潜在威胁来源”,也与中国的发展态势有关。另外,即使一个国家发展了,有了充分的资源,没有一个反映客观形势和符合国家利益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些资源也不能有效运用,仍然可能在安全上受到威胁。

区别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十分必要的。在现阶段,中国社会整体利益的核心无疑是发展,而发展的目的是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必须认识到,发展是以和平的安全环境为前提条件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顺利发展。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认识到,经济发展不一定必然带来和平与安全的环境,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更有可能被美国及其盟国视为潜在的威胁和对手,从而导致整体安全环境的恶化。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别主要涉及国家发展战略